也談宋慶齡

——剖析孫宋聯姻經過與宋傾共原因

莊政

好奇心理神秘色彩

縱觀古今，橫覽中外，英雄美人、兒女情長的奇遇艷史，自然成爲街頭巷尾民間所流傳的故事；輒爲小說、戲劇取材的對象。而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宋慶齡女士的海外聯姻，決不止於私情，故非「英雄美人」四字所能形容；因係頂尖政治人物，尤非「兒女情長」一句所宜涵蓋。

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 中山先生不愧爲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人，當年他與宋慶齡因共事而相愛，而結爲夫婦，堪稱世界性的重要新聞，吾人不難想像往昔轟動一時之熱況。事隔至今已近三分之二世紀了，猶爲人們所津津樂道，尤其是大專院校的男女學生，對於此事更是充滿了好奇，巴不得「打破沙鍋問到底」。然而每因格於現實的政治因素，誰也不願意多事，於是更使此事平添了幾許神秘的色彩。

由於宋慶齡的逝世，堪稱世間一大新聞，國內外的報章雜誌競相報導已不算少，然有若干錯誤，不免以訛傳訛（如謂一九一一年，在東京爲國父之英文秘書，即一顯例）。況且直到目前爲止，仍缺乏有系統、完整性的介紹與分析。例如他們畢竟是怎能認識的？他們由相愛而結婚、由革命而從政的種種歷程？（前者牽涉到孫先生原配盧夫人，她何以甘願成全其事；後者則涉及民國十年左右錯綜複雜的政局）宋慶齡出身豪富之家、飽受美式教育，何以一向傾共？但爲解釋上述各種問題，筆者廣事搜集史料，苦思窮研，略有所獲，本文希能提供一得之愚。

宋耀如逃家求學記

中山先生在什麼時候認識宋耀如的，現無史料可資佐證。一般的推測：以一八九四年春，孫先生偕陸皓東北上，準備上書李鴻章，途經上海時，曾晤王韜等人，交換改革政治的意見，王韜曾爲孫先生修改上李鴻章書。而陸皓東年少時即曾在上海電報局工作，對上海的情形自然比較熟悉，很可能時與在滬的廣東同鄉有所往來，早已認識了當地的粵籍傳教士宋耀如，而況 中山先生與陸皓東早在一八八三年冬，已在香港美國綱愼會受洗。宋耀如早年在美國神學院接受教育，返國後在上海傳教，且頗留心於政治，他們可以說是志同道合的友伴，殆於此時訂爲莫逆至交，後來 中山先生在一八九四年底，檀香山興中會成立不久，即返國進行革命工作，乃係採納宋氏的意見。

頃據晉籍者宿相告：宋氏始祖源出山西，未諳始於何時，北人大舉南遷，乃定居於當時南蠻未化之地的中國最南端的大島——廣東文昌（即海南島），宋耀如（嘉樹，英文名查理）自幼追隨叔父遠往美國波士頓，開餐廳維生，其叔因無子嗣，幾視其姪如己出。某次，宋耀如在餐廳中與中國留學生攀談，對他們的讀書生活至表羨慕，他很想跟他們一樣地過着學生的生涯，乃將此意願向叔父透露，無奈其叔父跟當時保守成性的國人一樣，祇希望他能專心致力於餐廳工作，繼續其志，克紹其裘，以奠定事業與經濟的基礎。而宋耀如則希望白天在餐廳裏工作，利用夜間去學校裏讀書，但仍未能如願以償。最後他乃出下策，趁人不備之際，偷偷地離開了餐廳，與叔父

不辭而別。置身異域，人生地疏，他似乎不知逃往何處爲妙，信步溜至一隻船上，航行經過米西西比河時，在船中被人逮住，送到船長那裏去，所幸船長乃一虔誠的基督徒，仁慈爲懷，不但未訓斥他，反而溫語慰問，始知他因想進學校讀書未能如願，憤而離家出走，因此對他深表同情，嗣經介紹至船長朋友處，蒙其慨然相助，進入神學院攻讀，苦修神學，歷有年所。學成後返國，在蘇州傳教，與當地女子倪氏結婚，嗣至上海仍服神職，並經營出版事業，甚爲得法，因而發家。生育三男三女，依年序爲：長女靄齡、次女慶齡、長男子文、么女美齡、次男子安、么男子良。其中與現代中國政局關係密切之三人，爲宋子文（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四日至一九七一年四月廿四日）。宋慶齡（一八九三年一月廿七日至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九日。按大英百科全書，載明她係一八九二年出生，私忖殆係按農曆壬辰年十二月十日，折算而成之故。），宋美齡（一八九七年六月五日出生，因身體不適，刻在美國療養中）。

傳記資料尚有疑問

若干外國學者所寫的孫中山傳記，認爲宋慶齡在幼小時已認識這位父執——孫文先生，並對他的言論、風采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已爲她後來追隨孫先生從事革命工作而播了種。最顯着的例子，是在美國出版的「宋氏三姊妹」一書，關於孫、宋聯姻的經過，有較詳盡的敘述：

「慶齡在韋斯萊大學畢業了，那是一九一三年；不久她就和朋友起程回國。……當她還是一小姑娘的時代，這（按指蘊在心內的一種秘密）早已萌芽了。她曾說：『那人（按指　中山先生）說中國在睡着，這人是另具眼光的。』全家聽了都很驚異。稍長，不知不覺中，又脫口而出：『我也決定如此。』意思即獻身革命。」

「你願不願要我？我知道你曾經結過婚，但是那已經過去，可與目前的事情不發生什麼關係。……至於說到後悔，因爲我小時候聽你講過：要是我不爲一件偉大的事業而生存，那末生命無意義而沒有中心的了。」

以上這些類似的資料，曾廣被撰寫孫先生傳記者所徵引，實則其可靠性頗有問題：因爲中山先生與宋耀如相識於一八九四年初春，當時宋慶齡不過是一二歲的嬰兒，即使她見過中山先生，也不可能留些什麼深刻的印象，又怎能記得住上述種種發人深省的名言呢？這顯然是作者以寫文藝小說的筆法來處理史實，實在是無稽之談，想當然耳。筆者判斷其可能的事實是這樣的：宋耀如既與中山先生爲革命同志，未幾，甲午戰敗，清廷割地賠款；五六年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辛丑和約、庚子賠款（連本帶息共爲九億八千二百二十三萬兩），致使國將不國，清廷敗象畢露，此時宋耀如身居上海租界，得到的消息最靈通，很可能時與黨人往還，並與家人談論時事，自然而然地會想及革命領袖孫中山的種種，因爲宋耀如「視逸仙爲其理想的領袖……他不僅贊助孫的革命事業，並且欽佩孫的偉大人格。慶齡幼年時，是在她父親崇敬孫逸仙的時候長大，差不多視孫爲其家庭的一分子。」

橫濱結識幾重因緣

宋慶齡自幼在上海接受新式教育，早年在當地中西女子中學讀書，於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三年，在美國喬治亞州梅肯的衞斯理女子學院哲學系求學，攻讀五年，獲哲學士學位。學成返國前，不免覺得前途茫然，如何學以致用呢？有時她想追隨母親，從事教會工作；有時想要追隨父親，以改良中國政治；有時也想向姊姊看齊，由結婚而取得顯要又富綽的地位；最後，她決定實現童年的夢想——委身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做革命領袖的秘書，豈非一條捷徑？

中山先生於民國肇建，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宋靄齡即曾擔任英文秘書。兩人相處融洽，感情甚好。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住在上海的宋氏父女曾將產業遷移至日本，追隨孫先生繼續從事革命工作，宋耀如經管財務，而宋靄齡已成爲孔祥熙夫人，其妹慶齡於一九一三年自美至橫濱登岸時，靄齡即將臨盆待產，不能前來迎接。而前往碼頭迎接她的正是姊夫孔祥熙與孫中山先生。

根據一些史料記載：宋慶齡是自願接替乃姊工作，擔任　中山先生的秘書工作的，她的外文甚佳，能力頗强，自信能合乎其理想，而勝任愉快。至於她與　中山先生由相處而認識了解，而產生感情，進一步表示愛慕之意，則是由她主動的。她生長在中國最大都市的上海，一個基督教的家庭之中，飽受西式教育的薰陶，自由思想很

濃，顯然不似一般少女那麼矜持，她曾向　中山先生示愛，甚願以身相許。　中山先生雖然很了解她的抱負，但對這突如其來的感情，似乎也處於矛盾的狀態之中，一時難作斷然的處置。在理智方面來說，他是她的父執之輩，比她要大上二十七歲；他的兒子孫科比她都大一兩歲；他不能做對不起她父母的事……。但在感情方面來說，從那時算起，他立志從事革命工作已經將近三十年，在此期間，曾有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獨自過着感情空白的生活，誠如他的良師益友康德黎博士所云：「他曾是一個被棄者，遠離家園，時而逃避於甲地，時而逃避於乙國，全宇宙似乎沒有他的立足點……他無時不感覺到一種殘酷的死亡，迫在眉睫。」在如此的狀況下，忽有一個年輕、貌美、志同道合又極爲崇拜他的人，主動向他獻上愛情，這恐怕是不易斷然拒絕的。

國人在傳統的習慣，爲聖哲豪傑立傳述事，往往描敍得過於神聖莊嚴，旨在使下取法乎上，結果却不免令人興起「高不可攀」之嘆。至於私人感情生活方面，不是語焉不詳，就是任其闕遺，深恐觸及兒女私情，對聖哲的形象不無破壞的影響。實則世界上再了不起的偉人，也跟一般常人一樣地有血肉之軀、有難以泯除的七情六慾。總之，再不平凡的人也有其極平凡的一面，我們若能深切了解這一點，就不會「神化」某人了，自然也就不會苛求某人了。對於曠世偉人，一代聖哲的孫中山先生，我們似也可作如是觀。

愛情順利婚事波折

中山先生與宋慶齡女士由相愛而論及婚嫁，他們的感情的發展是直線的，頗爲順利；然而他們婚姻的過程却是曲折的，並非順利。這話要扯得遠一點，因爲在以家族爲社會結構基本單位的中國社會中，男婚女嫁，不僅是兩個當事人的事，也是一家一族的事，至於尊長至親似乎都有「拿主意」（意見講通）的權利與義務。　中山先生於二次革命流亡日本期間，未與家人共居，而是多年追隨他革命的親密同志却纔在他的四周。與他聲氣相求，患難相扶，其親密程度有如家人。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中堅幹部，如胡漢民、汪精衞、朱執信等，皆反對孫總理再婚，他們一直認爲他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一國之父，兆民之表，應該保持一個「白璧無瑕」、「金甌無缺」的形象。可是他們的領袖的想法却與之有一段距離：他是一個革命家、一個社會的改造者、一個飽受西方文化薰陶、自主性很强的人，他在年少之時已遵循中國舊式習俗，在家長安排下完婚，事實證明：那並不是一次十分美滿而成功的撮合，現在他遇到了眞正志同道合，兩相情悅的並願以犧牲奉獻的精神，以身相許的理想對象，對於任何人來說，這股力量似乎都是難以抗拒的。

相傳胡漢民、朱執信堅決反對孫、宋聯姻，但他們畢竟拗不過當事人。當他們向孫先生面前諍諫時，他坦誠地回答：「展堂、執信！我是同你們商量國家大事的，不是請你們來商量我家庭的私事。」他對自己的左右手如胡、朱二人，尙且如此的直言無諱。對於其他反對他再婚的同志說過：「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慣所支配。」「你們是可以到外邊去玩兒，我是不可以的。」（最後這句話，是筆者親聞追隨先生多年的廣東籍已故國大代表張惠長先生說的）這些話，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毫無虛飾，絕不做作。

中山先生允與慶齡結婚，但必須取得對方家長的同意，她回上海家中，向雙親說明內心蘊藏已久的秘密，宋母倪氏堅決反對，她責斥云：「慶齡！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他已經有二倍於你的年紀，……同時他又是一個結過婚的人。我決不會同意這件婚事！」她的父親宋耀如則施以「拖延戰術」，讓她等待一段時間，作冷靜的考慮後再說。

等待了一段時間，宋母倪夫人的態度依舊，而宋父看得出女兒決心已下，難以改變，似已默許了這門親事。宋慶齡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由中山信徒朱卓文的協助，迅速而秘密地離家出走，由上海「私奔」前往東京。

與盧夫人離婚詳情

還有兩個問題很值得研究：其一、孫、宋聯姻之前，是否已先與盧慕貞女士離婚？其二、孫、宋聯姻，始於何時？

儘管有些書籍認爲孫、盧祇是分居，並未離婚，然據筆者多方考證，證實他們是正式離婚的，並且辦過合法的離婚手續。筆者曾迭詢　中山先生在臺家屬，他們也承認確有其事。其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殆係孫、宋皆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該教向主一夫一妻制，孫先生要跟宋慶齡結

婚，必先與盧夫人離婚；否則，宋也決不肯下嫁，既違教義，又做側室（小星），這是她不會答應的。

至於盧夫人爲什麼情願與孫先生離婚呢？很可能是基於下列的多種的因素：其一、他倆是在少年時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親的，並非出自主動，感情基礎可能不太鞏固。其二、中山先生爲奔走革命，亡命海外二十年，與盧夫人聚少離多，在某些時期，甚至可以說他們祇居夫妻名份，長此以往，總不免使彼此感情漸趨疏離。其三、兩人的知識程度、理想與習慣，相差甚遠；盧夫人並不贊同先生的政治理想，他們的家庭生活是不快樂的。其四、盧夫人生性內向，對於政治調理沒有興趣，不願意應酬於交際場合，民國肇建，偕夫同居於京滬，更加重了他們間的差異。其五、盧夫人自幼喪父，脾氣並不好，然事母至孝，頗願以有生之年，侍奉高堂以終老。其六、盧夫人係虔誠的基督教徒，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可使精神昇華。其七、子女皆已長大成人，均在接受高等教育；其時長孫治平甫出生，子孫雖一時未在身邊，但在精神上已有寄托。其八、中山先生曾爲盧夫人的生活作妥善的安排，她居住澳門，時與親友往來，彼此照顧，不致寂寥。

相傳當時部分黨人反對中山先生與盧夫人離婚，他乃至內室與盧氏密談，不久兩人出來，盧夫人當着大家慨然表示：孫先生爲革命奔走海外，到處流浪，身心爲之交瘁，既然現在有人照料他身邊的生活，且有助於其政治活動，她願意成全其事，答應與孫先生離婚。大家聽完當事人都這樣表示意見，自然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結婚應在民國四年

至於孫、宋聯姻究在何時，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本文限於篇幅，無法多作考證。據黨史會編纂的「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載明爲民國三年十月廿五日在東京結婚。惟其註釋方面，復引盧夫人答香山商會函，略云：「先伯（按指德彰公）離世後，電召氏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惟年譜載明：德彰公逝世於民國四年二月十一日，而馮自由所撰「孫德彰事略」云：「民國四年以病卒於澳門旅次。」果如盧夫人所云，德彰公逝世後，始應召至日本，那麼，孫、宋聯姻，必在民國四年，而非三年可知。頃閱中共刊印之「孫中山年譜」，係由宋慶齡親自題字，所載孫、宋聯姻，係民國四年十月廿五日，類此重大事件，宋氏不可能不過目，如有錯誤，自然不會視而不顧了。

長相陪伴同經患難

中山先生與宋慶齡女士結褵，乃是由自由戀愛，感情成熟後而論及婚嫁，而況兩人所受的教育，所持的志趣與理想幾乎完全相同，這是一對美滿的婚姻。民國五年三月，孫氏夫婦自日本返上海，自此以後的十年中，中山先生繼續領導革命，其間數度蟄居上海，著書立說，或開府廣州、主持政務，夫婦常在一起，聚多離少。民國六年十月二十日，先生胞侄因公殉難於黃埔海面，極爲哀痛！即迎養其遺孤孫滿、孫乾兄弟於大元帥府，孫夫人每晚替他倆鋪牀，愛護備至（當時經費奇絀，未僱傭工，家事皆由她親自操持）。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率軍叛變，中山午夜驚醒，悲憤得竟欲以身殉職，後經部屬强挽出府，本欲携夫人同行，以目標顯著，恐遭不測，她促請先生先行，自己及侍從人員留在府中，抵抗叛軍，終以寡不敵衆，總統府被攻陷，流彈數度掠過孫夫人鬢邊，叛軍持械將其所携物品搶刼。馬湘、黃惠龍乘機各引夫人手，奔入人叢，方得逃出，孫夫人在逃難途中，驚惶疲憊交迫，次日夜晚，竟至小產，使她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

民國十二年初，滇桂軍克廣州，陳炯明敗退惠州。先生偕夫人自上海抵廣州，續行大元帥職權。是年十月廿一日，因東江滇、桂軍失利，先生偕夫人暨俄顧問鮑羅廷與諸幕僚巡視虎門要塞，悉調海防諸艦，會於虎門，然後赴太平墟。次日，親率各艦返回廣州，工商學各團體上請願書，請早定北伐大計及組織革命政府。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廣州蒙難兩周年紀念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先生偕夫人率屬員等親臨主持致訓。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先生偕夫人與隨員二十餘人，離粵啓程北上，行前視察黃埔軍校，並向師生告別。

北京病篤臨終痛哭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四日正午，中山先生偕

夫人及隨員等乘船到達天津，至碼頭歡迎者約二萬餘人，盛況空前。　先生自幼生長於我國南端之香山縣，性頗畏寒，而天津多季天氣嚴寒，他立於船頭接受歡迎時，脫帽太久，遂爲風寒所侵，抵達天津後，往返河北曹家花園，旅途勞頓，漸感不支，於同行館後，身體冷熱無常，患重感冒，而肝部甚痛，病勢沉重，乃於除夕下午偕夫人等至北京。

中山先生至北京後，病勢日益加重，羣醫會診，須動手術，夫人先勸割治，遂即入院開刀，肝部堅硬如木，斷定爲肝癌末期，西醫束手無策。張靜江建議服中藥，以盡人事，夫人及侍疾同志力請，勉强允諾，然仍無效。重要同志有爲先生預擬遺囑之議，傳由吳稚暉起草，復經會議斟酌修改，終由汪兆銘筆記，並委婉面向　先生陳述，當蒙認許，原擬簽字，適時夫人聞後，在室外哭聲哀痛，爲免使其傷心，暫不簽字。其後病勢垂危，　先生囑將遺囑送上，由夫人扶持其右手，用孫科之自來水筆簽名於遺囑上，　先生腕力雖弱，然字跡仍清晰。至三月十二日九時卅分，　先生心臟跳動停止，一代偉人溘然逝世，夫人等侍疾同志均悲泣不置，痛哭失聲。

寧漢分裂開始袒共

中山先生逝世不久，上海「五卅」慘案發生，激起全國各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怒潮。宋慶齡時居上海，目睹耳聞其出生地發生列强欺壓同胞的不平事件，極爲憤慨，痛斥「英日强權對於中國革命精神之壓迫」。民國十五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擧行，她被選爲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婦女部部長。同年十一月底，國民政府決定遷移武漢。十二月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在武昌成立中央臨時聯席會議，爲鮑羅廷所操縱，推徐謙爲主席，宋慶齡等爲委員。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她在漢口爲婦女開辦了「政治訓練班」。同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右派」實行全面淸黨，上海總工會赤色工人糾察隊被駐軍白崇禧繳械，宋慶齡和國民黨許多左派人士及中共頭目聯名通電反對。七月十四日，武漢中央通過取締共產黨案之前夕，宋慶齡聲明，公開宣布同孫中山事業的「叛徒」決裂。八月一日，中共擧行南昌暴動，她竟表示支持。同月下旬，由於政治因素，與鄧演達、陳友仁等隨鮑羅廷「被迫流亡海外」，先後寄居莫斯科和歐洲各地。旅歐期間，積極參與「國際的反帝國主義」和「保衛和平的運動」。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在比利時、民國十八年某月在德國召開的兩次「國際反帝國主義同盟大會」上，宋慶齡都被選爲大會的名譽主席。同年六月一日，國民黨奉安　孫總理靈櫬於南京紫金山之陽，宋慶齡已於事先由黃琪翔陪同返國，曾着黑色喪服，參加　中山先生奉安紀念活動，時年三十六歲。

幾種刺激記恨報復

宋慶齡爲什麼要向着中共呢？這是一個十分敏感而嚴肅的問題，自她去世迄今，遍閱各報章雜誌，祇有簡略的報導，迄無較爲詳盡的剖析，本文試作探討：

——孫、宋聯姻，曾爲部分重要黨人所反對，尤以胡漢民爲最。　中山先生逝世後，胡漢民等所謂「國民黨右派」一批黨國元老，對其難免仍存芥蒂，致生被冷落之感（甚至有人認爲先生之早逝與宋氏不無關聯）。而中共慣於統戰，却把她捧得很高。如在民國十六年，北伐戰事頗爲順利之際，何香凝與宋慶齡正忙於勞軍，而周恩來之妻鄧穎超也參與其事，她們皆視右派爲孫之「叛徒」。

——民國初年，軍閥割據，英、日列强帝國主義者，分別支持軍閥，深恐革命成功，中國統一，勢必取銷不平等條約，影響其在華的特殊權益。陳炯明所以敢於公然叛變，即英國在暗中所指使，當時在粵黨人「仇英」心理益烈。廣州蒙難，宋慶齡於倉皇逃命中，竟至流產，對於一個女人來說，不但在健康方面受到嚴重的損害，而精神上所蒙受的創痛，尤其嚴重。根據心理分析，當一個人壓惡於某一方面時，無形中就會傾向於另一方面。蘇聯時距十月革命成功不久，頗思討好於中國，旨在抵制英日勢力在華擴張。故於民國十一年八月，　中山先生離開軍艦到上海後，着手改組國民黨，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宋慶齡在　孫先生與中共代表、列寧特使磋商交談時，不免受到他們思想的影響。

——宋慶齡在公私方面，似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跟別人搞第三勢力，「沾了先生的光」，在政壇上成了不倒翁、常青樹，她之一向傾「左派」，未嘗不是對「右派」基於一種報復底心理。民國二十年，鄧演達謀叛被捕，她曾力保未遂，鄧終於難逃死於非命的噩運，她對此事不

免耿耿於懷。兩年後，密友楊杏佛（銓）車中被刺，她的同路人又弱一個，精神上很受刺激，似乎極易激起「一不作，二不休」的極端心理與偏激行爲。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宋慶齡自香港脫險至重慶，曾住其姊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家中，相傳曾被「監視」，行動並不「自由」，果如斯，殆係仍與左派人士往來所致。其後改住其弟宋子文家中，仍然未能斷絕與彼等有所連繫。勝利後，相傳她蟄居上海一矮屋中，是否被迫如此，還是有心人搞的「苦肉計」，那就很難說了；其後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她也就順理成章地做中共的「副主席」了！

不甘寂寞知識有限

——中山先生在時，不管怎麼說，她是中國的第一夫人，甚至有人愛屋及烏，尊崇其爲「國母」。（按國民政府明令尊稱　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國父，係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事。惟於辛亥革命成功時，　先生初抵上海，已有被稱爲「國父」之說，惟鮮見諸文字耳，果爾，有　國父則必有國母。至少在現存黨史會文件中，曾見有人稱其爲「國母」者，或係民國廿九年後事，亦未可知）惟其政治是很現實的，她想想過去，看看現在，心理障碍，能無感慨？這也可能是她與其親人分道揚鑣的因素之一吧！

——宋慶齡生長在上海，自啓蒙即受西式教育，留美期間所學的是西洋哲學，她所受中國文化的薰陶極爲有限（中共最近編的「孫中山年譜」，由宋慶齡題字，字體歪斜，書法很差，可見其讀中國書很有限）。在意識型態上，其西洋成份要比中國成份爲多。這與　中山先生學貫中西，不能相比，因此雖親爲夫妻，彼此見解仍有差距。如果我們直覺地認爲　中山先生的夫人，當然最了解他的思想，那祇是想當然耳。實則他倆相處的時間並不長，無論在日本、上海、廣州、北平，她既要照顧　先生生活，又要協助他處理許多公私的機密文件，在此情況下，她過的是繁重、緊張而危險的生活。不可能有太多的時間去研究學術思想等重大的問題。而況　先生在世時，從未畀予宋氏任何公職名義，她活躍於中國政壇上，那是　孫先生逝世以後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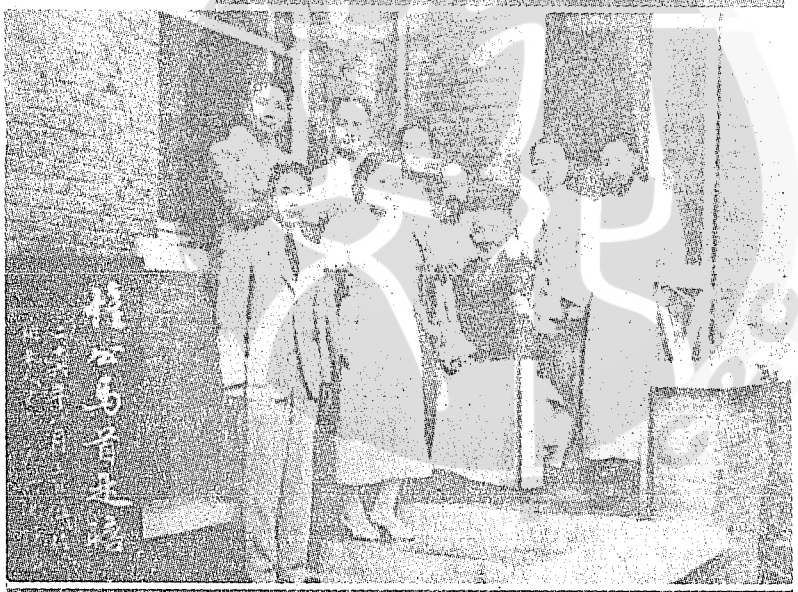
——宋慶齡於民國十五年一月，於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時，極力主張「要忠實執行孫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且「勇敢地譴責了國民黨內反對革命的右派份子」。殊不知　中山先生的外交方針原來採取「仇英、防俄、聯合美日」的政策，當時英、日帝國主義者，謀我正亟，而美國外交則以英國馬首是瞻，廣州政府在列强環列、虎視眈眈，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西伯利亞方面乃伸出友誼之手，而況蘇俄代表與　先生發表聯合聲明時，咸認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國民黨允許共產黨人以私人資格加入之，這是「容共」；至於農工政策，先生早於一八九〇年，致鄭藻如書中，首倡「改良農桑業」。他出身寒素，崛起民間，早已注意勞苦羣衆生計問題，怎會等到卅年後，有了中共，始注意及此呢？

——宋慶齡大學時代是學哲學的，似乎屬於理想主義者，而其思想傾共，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後來受其女秘書廖夢醒（廖仲愷、何香凝之女、廖承志之姊）的影響，不過是原因之一罷了。

與離心份子相往還

民國二十年，宋慶齡回國，積極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張——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於南京政府當時對日採取隱忍政策，頗表不諒。民國二十一年，日本軍閥侵略上海、强佔閘北，駐軍起而抗戰，爆發了「一二八」事變，宋慶齡主張積極抵抗到底。同年十二月，她和魯迅、蔡元培、楊杏佛（銓）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掩護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從事種種非法的活動。在此時期，她參加了國際間的「反法西斯運動」，爲民國二十三年在上海舉行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的領導者。

民國二十三年，中共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經宋慶齡簽字公布。民國廿四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民國廿五年五月，沈鈞儒、鄒韜奮等，與中共當時所提出的政治主張一致，在上海發起成立所謂「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宋慶齡爲執行委員。同年十一月，南京政府下令逮捕該會成員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女）、章乃器、王造時，造成轟動一時的所謂「七君子事件」。宋慶齡曾親至蘇州，向高等法院要求進入監獄，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



（上）宋慶齡民國二年美國威斯里大學畢業取得學位時。

（中）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在南京由宋慶齡營救出獄之救國會七君子：章乃器、沙千里、鄒韜奮、王造時、沈鈞儒等與馬相伯合影。

（下）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四月十五日毛酋澤東亂「蓋」國內外形勢，宋慶齡與班禪喇嘛等被迫作聽衆。

」。政府於次年六月將七人釋放。

民國廿六年二月，宋慶齡聯合國民黨內的離心分子馮玉祥、何香凝等，在三中全會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建議等，同年十一月，發表「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表示積極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民國廿七年六月，她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大同盟」，致力於戰時醫藥工作和兒童保育工作。總部設在香港，一則向國外和華僑宣傳抗日運動（多爲中共宣傳），一則向世界各地募集醫藥物資等的援助，而將其全部物資援助中共軍隊及其控制區域的人民。民國卅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即進攻香港，她在日軍侵入機場前的六小時，才乘最後一架飛機到重慶去。她在重慶期間，發起和領導了「保衛中國同盟」，吸收中外人士參加，並動員國際輿論和爭取國際援助。這時她仍經常與中共有密切的往來，在政治上她與姊妹是分道揚鑣的。

勝利之後傾共活動

抗戰勝利後，宋慶齡自重慶返上海，從事「保衛中國同盟」工作，嗣更名爲「中國福利基金會」。在工人麕集的上海，她搞戰後救濟工作，包括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建立兒童劇院等。民國卅五年，中共到處作亂，政府綏靖、戡亂。而她要求成立「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停止軍援，無異助長於中共，此一聲明曾引起國際間廣泛的注目，等於爲中共「解放」預作鋪路的工作。

民國卅七年，宋慶齡與國民黨分歧人士李濟琛、何香凝、馮玉祥等人爲首，在香港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宋被邀擔任該會的名譽主席。在國難當頭，此一第三勢力的形成，不免使親者痛、仇者快，終爲中共之附庸耳。

民國卅八年，戰局逆轉，政府播遷來臺，宋慶齡仍留上海，中共拉攏她，而其傾共的立場更顯明了。中共旋即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特派周恩來之妻鄧穎超，携帶毛澤東的親筆信，去上海看望她，邀其北上，共商大計，任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當選爲「第一屆人大副委員長」，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決定以毛澤東爲首，宋慶齡、郭沫若、沈雁冰等爲「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當時毛澤東曾跟蘇共頭目說，「他們三人現在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我們把他們當我們黨的同志一樣看待。」

相傳宋慶齡正式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是在一九五八年。當時劉少奇、周恩來有次在上海去看她時，劉回答說：「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還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她表示理解中共的考慮。

多次抄家政治花瓶

一九五九年四月，她出任中共的「國家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四屆人大，又當選爲「副委員長」，以迄於逝世。如衆所周知，她在彌留之際，神志不清之時，中共宣稱接收其爲黨員，並授予「名譽國家主席」的名義。

宋慶齡一向傾共，雖被中共捧爲「功臣」，奉爲「國家領導人」，地位雖高，然乏實權。且在文革期間，一樣當災，被紅衛兵抄家兩次。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起，北平街頭貼滿了抨擊宋慶齡的大字報，指控她是「來自一個剝削階級的家庭，屬於五類（黑五類）分子」，當時周恩來曾要求紅衛兵停止這項行動，說她「在中共革命過程中，曾是一位英雄人物」。連毛澤東以下都對她非常重視，但也未能組止紅衛兵的暴行，終於一再被抄家。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紅衛兵闖入北平南小街宋宅，抄家及搬走家中各種財物。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九日，當宋慶齡的座車經過北平長安街時，紅衛兵把她從車上拉下來，並加辱罵批鬪，使此一向來傾共、年逾七五高齡的老婦，身心備受痛苦。這段時期，她底心情是沉重的，苦思不解，何以至此？於是度過了一段漫長而孤獨的深居簡出之生活。一九八〇年七月廿八日，即事隔整整十二年之後，她在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痛定思痛，仍難釋懷，她寫道：「十年浩刼（按指文革而言），就體能而言，要感謝毛主席保了我，但却使我日愈不安，羞愧於『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不能進入幹校……。沾了先生的光，把我長期擺在高臺上，算是一株點綴的小花吧！又不能那末美麗！不算吧！主席又不同意!!」以宋氏如此身分特殊的親共人士，都難免遭受被批鬪的厄運；有名無實、有職無權，竟然充作政治花瓶，等而次之之輩，也就可想而知的了。

（上）民國五年八月國父在杭州演講與宋慶齡及老同盟會員合影。
（中）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病逝北平親屬在靈前合影。
（下）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國父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奉安時之情景。

（上）右起不分前後排：魯迅、林語堂、蔡元培、伊羅生（美記者）、宋慶齡、蕭伯納、史沫萊等合攝於上海中山故居（民國二十二年二月）

（中）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十一月宋慶齡在上海與日本親共之友協訪問團合影。

（下）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五月二十九日宋慶齡逝世後其孫女兒孫穗美、孫穗華、外孫女戴成功及其他親屬在漢口宋氏遺體前攝影。

（上）右起：宋慶齡、蔣委員長、宋藹齡、蔣夫人在重慶合影。（民國三十一年二月）

（中）民國十六年三月宋慶齡在漢口南洋大樓出席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會議時攝。

（下）民國三十一年宋氏三姊妹在重慶視察保育院歸來時攝。